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26 年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4, No. 2 (2026)

# 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的本土化与文化坚守

朱晓天[*]、李健友[**]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春节作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在华人海外迁徙过程中被广泛传播。本文以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其传承脉络的基础上，通过与中国本土春节习俗的比较，考察其在多元族群社会中的本土化表现、驱动机制与文化坚守。研究发现，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在仪式形态、节庆饮食与社会功能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但其核心文化价值并未消失，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重新诠释与强化。本文基于“文化内核稳定—表现形式可变”的分析框架，认为本土化并非传统文化的消解，而是海外中华文化在异地社会中延续、调适与再生产的重要机制。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不仅维系了华人的族群文化认同，也推动了“华人”文化身份与“马来西亚人”国家身份之间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本土化、文化坚守、身份认同

[*] 朱晓天，现为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生。
[**] 李健友，现为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电邮：leekeanyew@um.edu.my

# Localization and Cultural Persistence in Chinese New Year Customs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Zhu Xiao Tian, Lee Kean Yew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festivals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New Year has been widely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overseas mig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ies. Taking Chinese New Year customs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as its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ir localized expressions, driving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persistence within a multiethnic society,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ir transmission and a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New Year customs in mainland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New Year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demonstrates distinct features of localization in ritual practices, festive foodways, and social functions. However, its core cultural values have not disappeared; rather, they have been reinterpreted and reinforced in a new social environment. Drawing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 stable cultural core and variable forms of express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ocalization does not signify the dissolu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instea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is continued, adapted, and reproduced in a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 Chinese New Year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not only sustains Chinese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but also promot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with a "Malaysian"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Chinese New Year customs, localization, cultural persistence, identity

## 一、引言

春节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维系家族伦理与凝聚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自 19 世纪以来随着华人大规模迁徙被带入海外。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华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3%。马来西亚族群由马来族、华族、印度族及原住民族等构成，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并存格局。在此背景下，华人春节仍保存了原本的精神面貌，并且因地理环境的变迁和时空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苏庆华，1994，页 2）。春节不仅是华人族群的内部节庆，也已成为马来西亚全国公共假日，并与开斋节、屠妖节等其他族群节日共同构成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节庆体系。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已成为观察海外中华文化传承与变迁的重要窗口。

围绕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的研究，学界已从习俗资料整理、身份认同与文化变迁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其中，早期研究多以民俗资料整理和习俗描述为主。赖观福等（1997）的《马来西亚华人节日风俗》系统梳理了春节、清明等节日的源流与形态，完整呈现捞生、舞狮采青等马华特色习俗，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苏庆华（1994）在《节令、民俗与宗教》中考证了天公诞、元宵节等习俗与闽南民间信仰的传承关系，并指出传统节庆包含伦理观念、价值认同与社会关系等深层文化结构，并非由固定仪式简单构成。王琛发（2001）则在探究马来西亚华人民俗源头、节庆活动与民俗禁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华人节日民俗的生存原因、发展机制及功能意义。Vaughan（1897）的《海峡殖民地华人风俗》作为英殖民时期的官方记录，为追溯 19 世纪槟城与新加坡华人的春节庆祝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参照。除此之外，陈晶芬（2011）以槟榔屿华裔族群为对象，考察了年节习俗与天公信仰的内在关联，并与台湾春节习俗进行比较，填补了区域研究的空白。陈佳杰（2017）以槟城武拉必新村为个案，通过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考察了新村华人新年习俗的传承与变化，是少数兼顾田野方法的实证研究。莫光木（2010）通过中马习俗的系统对比，归纳了马华新年的本土化特征，并从民俗文化与族际关系等角度论述了农历新年习俗的传承与发展，是近年来较具综合性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民俗资料和个案基础。

身份认同与文化变迁一直是海外华人研究的重要议题，何国忠（2002）在《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中强调华人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在多元社会中并非对立，而是形成动态的平衡。这一论断为理解春节习俗在政治语境中的功能转化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曾玲（2003）以新加坡为个案，分析了海外华人如何在移居地通过节日习俗重建社会组织与文化结构，论证了新加坡华人节日习俗的社群特征、节日习俗对于维系与加强华人的中华文化和族群认同的价值与功能，对马来西亚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陈志明（2012）关于迁徙、家乡与认同的研究则指出，华人文化在迁移过程中并非静态保存，而是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不断调适与重构，这种“变化中的延续”是文化发展的常态。沈

立新（2002）则从比较民俗学角度归纳了海外华人民俗“集体性、稳定性、变异性”三大特征。王赓武（2000）关于海外华人多重认同的论述，则进一步揭示了华人如何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寻求平衡。这些研究共同表明，海外华人文化的延续不能简单理解为原乡传统的完整复制，也不能简单视为传统文化的流失，而应被放置在迁移、适应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加以理解。以上为分析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本土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纵观上述研究，关于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的研究多集中于习俗描述与现象分类，对本土化背后的文化机制解释仍显不足；身份认同研究虽揭示了华人节庆的社会功能，但对具体仪式、饮食和节庆实践如何承载身份认同的分析仍有待细化；已有研究较少将中国本土春节习俗与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进行系统对照，因此难以清楚呈现哪些内容发生了变化，哪些价值仍然保持稳定。基于上述研究不足，本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相较于中国本土春节发生了哪些形式变化？第二，这些变化背后的本土化机制是什么？第三，在形式不断调适的过程中，春节如何维持团圆、孝道与祈福等文化内核，并进一步建构马来西亚华人的双重身份认同？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在仪式、饮食与社会功能等层面的本土化表现。文献分析方面，综合利用马来西亚华人节日风俗、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与春节文化研究等相关成果，梳理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传承脉络与现实变化；比较研究方面，则以中国本土春节习俗为参照，分析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形式变化及其文化意义。

文章首先界定春节的文化结构及其价值内核，其次梳理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传承脉络，再从仪式、饮食与社会功能三个维度分析其本土化表现，最后探讨春节核心文化价值的延续及其对马来西亚华人双重身份认同的建构作用。本文试图从“文化内核稳定—表现形式可变”的视角说明，本土化并非传统文化的削弱，而是海外中华文化在异地社会中实现延续、调适与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 二、春节的文化结构与价值内核

春节起源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节令体系，其形成与农业生产周期、自然节律以及祖先崇拜密切相关。历经数千年传承发展，春节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海内外华人最重要的情感纽带与文化认同符号（丁守春，2013，页 2）。传统习俗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传统习俗并非固定仪式的简单叠加，而是由深层的价值结构与外在的实践形式共同构成。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持续存在，关键不在于具体形式是否得到完整保留，而在于其核心价值能否持续获得集体认同并被反复实践。对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传承与演变的考察，有必要从春节的深层文化结构入手。只有厘

清春节习俗中哪些属于可随时代与地域变化而调整的外在形式，哪些属于相对稳定并持续发挥作用的价值内核，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 （一）春节文化结构的三重层次

传统节日并非外在习俗的简单组合，而是由深层价值、集体记忆与象征符号共同构成的文化系统（王文章，2010）。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的具体实践，将春节的文化结构分为仪式、生活实践与文化价值三个层面。仪式层面涵盖祭祖、守岁、拜年、贴春联、燃放鞭炮等，体现对祖先、神灵和时间秩序的敬畏；生活实践层面以年夜饭、走亲访友为核心，维系家庭团聚与社会联系；文化价值层面则居于最深层的结构位置，由家庭团圆、孝道伦理与吉祥祈福共同构成春节的精神内核。

### （二）内核的界定：团圆、孝道与祈福

春节作为综合性传统节日，包含丰富的仪式形式与文化意义。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春节习俗并不完全相同，但其之所以能够在长期传承中保持稳定影响，关键在于其背后存在持久的价值结构。本文所说的“文化内核”，并不是指所有具体习俗的完整保留，而是指那些在春节长期演变中持续发挥整合作用，并能够在不同地域和世代之间被反复实践、理解与传递的核心价值。

基于这一理解，本文将“团圆”“孝道”与“祈福”视为春节较为稳定的文化内核。“团圆”历来是春节最核心的社会功能，年夜饭的共同聚餐，不仅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也象征着家族关系的延续，在各类华人社会中长期居于核心地位。“孝道”则通过祭祖与拜年等仪式得以延续，晚辈对长辈的叩拜与祝福，是对代际伦理关系的确认，其凝聚作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尤为明显。“祈福”则体现了面向未来的积极精神，无论是对生活富足的期待，还是对子孙平安顺遂的祝愿，都赋予春节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意义。

从跨地域延续、跨世代传递以及海外社会实践的普遍性来看，“团圆”“孝道”与“祈福”更能构成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得以延续的共同价值基础。也正因为这些价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转化性，春节才能在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社会中通过不同形式继续被实践和再表达。

## 三、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传承脉络

自 19 世纪中叶华人大量南来至今，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传承实践经历了从生存传承到自觉传承的历史转变，本文依据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身份、国家政治环境与春节社会功能的变化，将春节传承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为移民初期

以生存互助与情感慰藉为核心的“异域重建阶段”；其二为国家独立后华人由“侨民”转向“公民”过程中形成的“族群整合阶段”；其三则是在多元文化政策与全球化背景下，春节逐渐走向公共化、国家化与自觉化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划分强调了春节社会功能与身份认同重心的历史转移。通过这一历史梳理，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本土化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在移民社会重建与国家身份转换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 （一）异域重建：文化秩序的移植与再造

大量劳工与自由移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南下马来半岛，主要从事锡矿开采、商业贸易活动。在陌生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春节传承对早期移民具有双重功能。其一为心理补偿与精神支撑：远离故土的移民通过延续祭祖等仪式，在异乡重建熟悉的文化环境，获得情感慰藉与归属感。其二为社会生存与族群凝聚：早期南来华人大多以血缘、地缘与方言群关系建立社会网络。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吉隆坡地区逐渐形成以宗乡会馆为重要纽带的华人社群组织结构。这些会馆不仅承担联络同乡、互助救济等功能，也在传统节庆期间组织聚宴与新春联谊活动，为离乡移民提供情感支持与社群归属感（郑名烈，2023，页 80）。Vaughan 对 19 世纪末海峡殖民地华人习俗的记录印证了这一点：华人极为执着地保持祖先习俗，即便与当地居民相处数代，仍小心翼翼地保留自身的风俗习惯（Vaughan, 1897）。在这一阶段，春节习俗的主要任务并非主动吸收地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在异乡重建原乡文化秩序，因此其本土化程度相对有限，文化保存功能更为突出。

### （二）族群整合：从侨民节日到公民节庆

1957 年马来亚独立后，华人逐渐由“侨民”转向“国家公民”，春节也由早期的“侨民节日”，逐渐转变为凝聚华人族群认同的公共文化实践。在以马来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为重要基础的国家文化政策背景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面临一定压力，由此激发了华社的文化忧患意识。祝家丰指出，在十五华团的带动下，马来西亚华社在文化忧患意识中展开了一系列保护文化根脉的行动；华人不仅在家庭中积极庆祝各种华族节庆，也广泛响应和参与会馆、乡团举办的文化活动（祝家丰，2013，页 51）。华人社会开始更有意识地借助社团组织推动社群整合与文化传承。国内华人社团出现整合趋势，会馆功能也随之由早期同乡互助逐渐转向社群凝聚与公共参与（郑名烈，2023，页 83）。中华大会堂、乡团会馆及华校机构组织新春团拜、醒狮庆典等活动，逐渐将春节发展为凝聚华社情感与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意识并非对原乡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少数族群处境与多元社会环境中，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主动确认。春节不再只是家庭团聚的节日，也逐渐成为华人社会表达文化归属与族群认同的象征，并开始承担更加明显的族群文化表达功能。

### （三）公共转型：多元文化政策下的自觉传承

在多元文化政策与全球化发展的影响下，春节逐渐呈现公共化与国家化的发展趋势。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代表出席华团新春团拜活动，春节由华人社群内部节庆逐渐转变为具有国家公共文化意义的节日。马来西亚的“开放门户”传统强调不同族群共同参与节庆，体现了多元社会中的跨族群交流，也使春节成为展示国家多元文化形象的重要场合。随着教育环境、社会结构与传播方式的变化，年轻一代参与春节的方式也不断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借助社交媒体、网络影像与数字传播等方式参与春节活动，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表达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在这一阶段，春节的本土化特征日益明显，节庆空间从家庭与华社内部扩展至商场、庙宇、学校、政府活动与跨族群互动空间。至此，春节已由早期移民社会中的生存性节庆，逐渐发展为兼具族群凝聚、国家公共性与文化自觉三重功能的文化实践。

## 四、马来西亚华人春节本土化的表现、机制与文化坚守

华人的文化身份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不间断的意义框架（何国忠，2002，页 10）。在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影响下，华人对春节习俗的传承逐渐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这种传承并非对原乡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不断调整。陈志明指出，文化延续实质上是“变化中的延续”，地方化在文化表达上改变了延续的性质，并结合了新的文化要素（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2012，页 12）。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化内核稳定—表现形式可变”的双重结构。

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的本土化，不能仅从外在形式的变化加以判断，而应将其置于马来西亚多族群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环境、华人少数族群处境以及跨族群互动实践之中加以考察。并非所有春节形式的变化都可直接视为马来西亚春节区别于中国本土春节的地方特色。诸如采尘方式现代化、年货筹备商品化、手写春联减少等现象，在当代中国本土春节中也较为普遍，更多体现的是城市化、商业化、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以及代际观念变化对整个华人社会春节实践的影响。因此，本文并不将上述现象简单归为马来西亚春节独有的本土化特征，而是将其视为春节在现代社会中发生形式调整的共同趋势。真正能够体现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地方特色的，是这些变化如何与多族群互动、节庆制度、华社文化动员相结合，并由此形成具有马来西亚社会特色的节庆实践。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中国本土春节为参照，考察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传承与变化。中国本土春节可作为理解春节文化原乡传统的重要参照，而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则体现出传统节日在跨地域传播过程中的地方化重构。二者之间的差异是

春节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进行调适的结果。以下将从仪式、饮食与社会功能三个维度展开分析，进一步揭示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的本土化表现及其文化意义。

### （一）本土化的具体表现：仪式、饮食与社会功能的转化

#### 1.仪式层面：从原乡礼俗到本土化重构

在中国传统春节习俗中，仪式通常围绕辞旧迎新、祭祖祈福与家庭伦理展开。扫尘、贴春联、守岁、祭祖、拜年、燃放鞭炮等习俗，构成了春节仪式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仪式不仅具有营造节庆氛围的作用，还通过反复实践强化家庭秩序与代际伦理。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在仪式层面同样保留了祭祖、拜年、贴春联、舞狮等核心形式，但其具体执行方式已随着城市生活、族群互动与地方社会环境发生调整。

首先，春节部分仪式形式的变化，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与代际变迁对节庆的影响。例如，传统“采尘”已不再是全家共同完成的体力劳作，现代家庭多以吸尘器取代传统扫帚，部分家庭甚至雇用清洁工人代劳。年货筹备也经历了从家庭自制到市场购买的商品化转变，手工制作年糕时伴随的言语禁忌与仪式细节随之淡化。手写“挥春”也大量被印刷春联取代。团圆饭虽然仍备受重视，但越来越多家庭选择在酒楼聚餐。这些现象并非马来西亚华人春节所独有，而是在现代生活方式影响下，当代华人社会春节实践中的普遍现象。

在马来西亚语境中，仪式变化的特殊意义并不只在于“简化”或“替代”，而在于仪式如何进入多族群社会并获得新的公共功能。相较于采尘、春联印刷化等现代化共同现象，天公诞的跨籍贯传播、舞狮的族群象征化以及春节团拜的公共化，更能体现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地方性重构。

天公诞即正月初九拜天公，原本具有较强的闽南民间信仰色彩。在马来西亚，这一传统习俗尤其盛行于槟城等福建人聚居的地区。每年正月初九凌晨，华人家庭设神台、摆祭品、燃香膜拜，并以甘蔗作为重要供品，寓意“节节高升”（陈佳杰，2017）。这一习俗原本主要流行于闽南群体之中，但随着马来西亚华人各籍贯群体的相互融通，近年来非闽南人如广东人、海南人和客家人等也开始拜天公（莫光木，2010）。天公诞在马来西亚并不是原乡习俗的简单保存，而是在不同籍贯群体互动中，逐渐转化为更具公共性的华人节庆实践。

舞狮的发展更能体现春节实践中的文化政治性。舞狮原本具有驱邪祈福、迎祥纳福的传统意义，但在马来西亚多元族群政治语境中，它被赋予了更强的族群文化象征功能。1979 年，当时的内政部部长加沙里表明舞狮没有本地色彩，不符合“国家文化”的标准，除非将它改成“舞虎”，要不然是不可能被接纳为国家文化（何国忠，2002，页 110）。这一言论引发华社强烈反应，华人社会将舞狮视为事关民族尊严与文化权利的象征，并以此激发维护华族文化的意识。舞狮在马来

西亚春节中的意义已经超越一般传统仪式，其原有的驱邪祈福功能仍然保留，但同时叠加了文化尊严、族群认同和文化维护等现代意义。

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在仪式层面的本土化，并非传统仪式的简单减少或现代工具的替代，而是春节仪式在地方社会中的适应性转化。采尘、春联、团圆饭等形式变化，更多体现了现代化影响下华人春节实践的共同趋势；相较之下，天公诞的跨籍贯传播与舞狮的族群象征化，则更能说明春节仪式如何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承载华人身份认同、文化权利表达与公共生活参与。仪式形式的调整并未造成春节传统的断裂，反而使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持续实践的可能。

**2.饮食层面：从节令食品到南洋春节符号**

在中国传统春节习俗中，节令饮食具有鲜明的象征性。北方春节重视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象征着旧年与新年交替；南方地区则常见年糕、汤圆、鱼、春卷等食品，寓意年年高升、团圆美满、年年有余。春节饮食不仅是节令食品，也承载着团圆、祈福与美好生活愿景。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同样保留了年糕、柑橘、花生等传统节令食品，但在长期南洋生活环境中，春节饮食逐渐吸收本地食材与多族群饮食元素，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节庆食物体系。

与仪式工具现代化等共同变化相比，饮食层面的地方化更能体现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本土特色。除红柑、红枣、花生等传统节庆食品外，春节饮食已逐渐融入马来族与印度族的文化元素：马来食品“果加蕉”与印度族食品“莫若谷”已成为华人年饼拼盘中的常见搭配；咖喱鸡、阿杂及竹筒饭等马来传统食物亦登上华人团圆饭桌；黄梨、红毛丹等热带水果同样被吸纳其中（苏庆华，1994）。这种饮食融合并非简单的文化被动接受，更体现了华人主动参与地方创新的能动性。由此可见，华人并非被动地受地方主流群体涵化，而是通过自身对地方社会的参与和互动，带来了华人自己的本土化（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2012，页 4）。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七彩鱼生”。这道如今已成为新马华人春节象征的菜肴，其形成过程鲜明体现出地方文化创新。20 世纪 40 年代，广东移民陆祯发在森美兰州芙蓉经营餐馆时，以广东鱼生为基础，结合本地食材与调味方式，逐步发展出富有南洋特色的“捞生”。此后数十年间，这道菜持续创新，食材从简单的生鱼片扩展为包括薄脆、青红椒丝、柚子肉、花生碎等在内的七色配料（Chan, 2016）。更为重要的是，伴随其流行，一种集体参与的“捞起”仪式逐渐形成，众人围桌而立，齐举筷子将食材高高挑起，同时高呼“风生水起”“步步高升”“年年有余”等吉祥话语。捞生的本土化意义在于它将春节饮食转化为一种具有互动性和公共性的节庆仪式。此外，捞生于 2009 年被纳入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仪式形态具备跨族群传播优势。该民俗以餐桌祈福活动为核心，无显著宗教排他性，可广泛运用于商业餐饮、企业年会与跨族群社交场景。非华人可以通过参与“捞起”动作和祝福话语进入春节氛围。“捞生”从粤式鱼生到南洋七彩鱼生的演变，呈现

了华人饮食在食材选取、调味方式与食用仪式上的本土化过程，最终从地方餐馆的菜式创新，演变为跨越地域边界的马来西亚华人春节标志性文化符号。

马来西亚华人春节饮食的变化，不只是节令食品在口味上的调整，而是春节文化在南洋社会中的再创造。捞生、南洋糕点、热带水果和多族群食物元素的加入，体现了春节饮食对地方社会的文化适应；而“年年高升”“年年有余”“风生水起”等吉祥寓意的持续表达，则说明春节饮食所承载的祈福内涵并未消失。饮食层面的本土化，正是文化坚守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具体表现。

**3.社会功能层面：从家庭节日到公共文化实践**

在中国本土社会中，春节长期以家庭和亲族关系为中心，走亲访友、拜年送礼和亲族聚餐等活动，既强化血缘伦理，也维系日常社会关系。尽管近年来城市春节出现商业化、旅游化和公共庆典化趋势，但其社会功能总体上仍主要依托家庭、亲族和地方社区展开。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在保留家庭团聚与亲友拜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更鲜明的公共性、跨族群性与公益性。

春节团拜是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公共化的重要形式。相较于传统的个人拜年，团拜活动通常由华团、会馆、学校、商业组织或政府机构举办，参与范围更广，社会功能也更为多元。它不仅是庆祝新年的节庆场合，也是社交联谊、商业交流、政治互动与文化展示的重要公共空间。在团拜活动中，舞狮、挥春、红包、贺岁歌曲、华文致辞等春节符号集中呈现，使春节从家庭内部的节庆实践扩展至华社乃至国家公共生活之中。由此，团拜不仅增强了华人社会内部的情感凝聚，也使春节成为马来西亚华人表达文化身份、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公共场域。

更能体现马来西亚地方特色的是“开放门户”（Open House）传统。Open House 是马来西亚多元节庆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交实践。开斋节、屠妖节、圣诞节和春节期间，不同族群常通过开放门户邀请亲友、邻居、同事及其他族群成员共同庆祝。马来西亚旅游局曾指出，Open House 是马来西亚人共同庆祝文化节日的一种独特实践，参与者包括家人、朋友和邻居；这一传统有助于促进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人际联系，并维系社会和平与和谐（Tourism Malaysia, 2018）。在春节语境中，Open House 使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成员得以进入华人节庆空间，共享食物、观看舞狮，并参与祝福和礼节性交往。通过这些互动，春节被纳入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公共生活之中。Open House 改变了春节作为“华人内部节日”的边界，使其从家庭内部确认血缘伦理的节日，进一步发展为跨族群交流与文化理解的平台。它体现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中特有的节庆交往模式，各族群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参与彼此的节日，形成日常层面的社会联结与国家共同体意识。

春节的公共化还体现在华社公益与文化动员方面。依托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长期形成的社团文化和公共参与意识，春节期间常常伴随着华文教育筹款、扶贫济弱和社会慈善等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春节舞狮采青与华文教育筹款的结

合。在中国本土春节中，舞狮采青主要具有祈福、娱乐和商业性质；而在马来西亚，舞狮采青与华文教育筹款结合后，被赋予了维护华人文化教育权益的社会功能。华教工作者、独中狮队和华社组织常在春节期间走访商家和住宅，通过贺岁采青筹募华校经费（莫光木，2010）。近年来，一些独立中学的新春醒狮采青活动也获得商家和民众的热烈响应，筹得大量经费。据媒体报道，巴生兴华中学乙巳年新春醒狮采青贺岁活动获得商家及民众热烈响应，为该校筹获逾 74 万令吉经费（星洲网，2025）。这种做法使传统春节仪式转化为支持华文教育、凝聚华社力量和延续文化根脉的重要公共实践。

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社会功能已经超越了中国本土春节中典型的家庭范围，发展为连接华社、友族群体与国家公共空间的文化实践。开放门户、春节团拜和华教筹款等实践，表明春节在马来西亚社会中进一步承担了跨族群交流、公共参与与文化动员功能。这种功能扩展为团圆、祈福与社群互助等价值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春节的公共化并非传统的淡化，而是文化坚守在多元社会中的延伸。

### （二）本土化的驱动机制：文化融合、制度环境与代际变迁

本土化进程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实现：多元族群互动中的文化融合、国家制度环境的政策支持，以及代际变迁带来的实践方式调整。三者共同推动春节从“中国传统节日”向“本地特色华人文化实践”的转变。

在多元族群共存的社会环境中，文化融合机制对春节的本土化发挥着基础作用。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与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族群共同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接触必然延伸至节庆实践之中。陈志明（2015）在讨论马来西亚跨文化交流时指出，经过长期互动，马来西亚各地的华人与当地居民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族群交流方式，可称之为“族群互动规范”。他特别提到，马六甲一些乡下峇峇华人会在农历新年除夕之前送年糕给马来邻居，且在除夕前赠送糕点表明这些食品未用于拜神祭祖，作为穆斯林的马来人可以放心食用，这已成为一种跨族群的节庆礼仪。与此同时，春节逐渐吸纳马来与西方节庆的表达方式，公共庆典、商业促销与现代文娱活动成为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购物中心已成为城市华人感知年节氛围的重要空间，各大商场以统一的新春装饰、促销活动与表演节目吸引人流，节日消费由此成为春节实践的新形式。这种多元文化互动并非单向同化，而是一种双向的文化再创造，最终催生出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节庆形态。

国家政策为春节的本土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马来西亚政府长期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承认各族群文化节日具有合法的公共地位，并将春节纳入国家文化建构的整体框架。从联邦到州级政府，每年均举办官方新春大团拜活动，政府官员出席致辞，主流媒体进行广泛报道，使春节获得了超越族群边界的公共能见度。在制度层面，春节被列为全国公共假期，各族群均可参与相关庆典，这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马来西亚节日”的社会认同。政府也通过文化拨款与旅游推广，将春节庆典塑造为国家多元文化形象的展示窗口，以吸引国际游客。槟城、吉隆

坡等城市的新春灯饰与大型庙会，往往获得地方政府的资源支持，成为兼具文化展演与旅游经济功能的公共活动。

代际差异同样在深层重塑着春节的实践形态。不同世代对春节习俗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老一辈往往强调仪式的完整性，倾向于维持较为繁复的祭祖程序；年轻一代则更注重节日的情感体验，对复杂的仪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受教育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年轻一代普遍需同时掌握马来语与英语，其语言习惯较上一代已发生显著转变。然而，正如陈志明（2012）所指出的，族群认同的延续并不严格依赖于特定语言，但语言变迁会影响对认同的理解与文化表达。传统习俗的延续因此并不取决于形式的完整复制，而取决于价值的有效传递。即使语言偏好发生变化，只要年夜饭、祭祖等核心仪式仍得以保留，华人文化认同便能够延续。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对春节的参与方式更为灵活多元，倾向于通过线上拜年、社交媒体互动或短途出游等现代方式参与节庆活动。

### （三）文化坚守与双重身份认同的实践统一

正是在“内核稳定、形式弹性”的双重结构基础上，春节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维系文化传统与调适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所谓“文化坚守”，并非原封不动地复制中国本土春节形式，而是在本土化过程中延续春节的核心价值、文化记忆与族群认同。马来西亚华人春节虽然在形式上随社会环境而变化，但其作为华人文化象征的基本意义仍然得以保持。

文化坚守首先体现为春节核心价值的延续。无论是家庭团圆、祭祖拜神，还是拜年祝福、红包馈赠，其背后所承载的团圆、孝道与祈福价值，仍然构成春节实践的深层结构。即使团圆饭由家庭厨房转向酒楼餐馆，春联由手写变为印刷，拜年方式由登门拜访扩展至线上祝福，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实践形式和传播媒介层面，并未改变春节确认家庭关系、维系代际伦理和表达新年愿望的基本功能。春节正是通过年夜饭、祭祖、拜年、红包和吉祥话语等重复性实践，将家族记忆、祖先记忆与华人文化符号传递给下一代。

文化坚守也体现为族群边界的维持。在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社会中，春节不仅是家庭节日，也是华人群体展示文化身份的重要时刻。舞狮、春联、红包、祭祖、捞生等符号，使华人文化在公共空间中具有鲜明的可识别性。随着春节进入商场、学校、政府活动和跨族群互动空间，华人文化并未在公共化过程中被削弱，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获得展示与确认。

在此基础上，春节进一步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协调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实践空间。一方面，春节通过节庆仪式和家庭实践，持续强化华人群体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联结，使“华人”这一文化身份在多元族群环境中获得现实表达；另一方面，春节作为全国公共假日，与开斋节、屠妖节等其他族群节日共同构成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节庆体系。春节团拜、开放门户、舞狮表演和各族共庆等形式，

使春节不再只是华人社群内部的节日，而成为不同族群共同参与和理解华人文化的重要公共文化活动。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彼此排斥，而是在春节实践中形成动态平衡。“华人”身份强调文化记忆、家族伦理与价值传承，“马来西亚人”身份则指向政治归属、公民身份与国家公共生活。春节正是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发挥连接作用：它既使华人能够延续自身文化传统，也使这种传统在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中获得合法性与公共表达空间。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本土化并没有削弱文化坚守，反而使华人文化能够在新的国家与社会语境中持续获得生命力。

## 五、结语

通过对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传承脉络、本土化表现、驱动机制与身份认同的系统考察，本文认为，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并非中国本土春节在海外社会中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多元族群环境中不断调适、重构与再生产的文化实践。与中国本土春节相比，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节庆仪式、饮食形态和社会功能等层面，但其所承载的团圆、孝道与祈福等核心价值仍然得到延续。

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呈现出“文化内核稳定—表现形式可变”的结构特征。仪式简化、饮食融合与社会功能扩展，体现了春节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适应性调整；而团圆、孝道与祈福等核心价值的延续，则说明这些形式变化并未改变春节的深层文化意义。正是在这一结构基础上，本土化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春节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马来西亚华人根据地方社会环境不断调整春节的表现形式，使其逐渐形成具有南洋特色和多元文化色彩的节庆形态。由此可见，春节传统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具体仪式形式是否被完整保存，而在于其核心价值能否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继续被认同、实践与传递。

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春节的本土化与文化坚守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在春节实践中相互支撑。春节在变化中持续维系核心价值、文化记忆与族群认同，既延续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根脉，也推动了“华人”文化身份与“马来西亚人”国家身份的协调。由此，海外华人文化的延续可被理解为一种“变化中的延续”：本土化不是文化认同的削弱，而是海外中华文化保持生命力与文化韧性的重要条件。

## 参考文献

陈佳杰（2017）。《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研究——以武拉必新村为个案》［硕士学位论文，拉曼大学］。UTAR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http://eprints.utar.edu.my/2537/1/fyp_CH_2017_TJK_-_1303607.pdf

陈晶芬（2011）。《马来西亚华人的年节习俗与神话传说——以槟榔屿华裔族群为主》［硕士学位论文，国立政治大学］。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0NCCU5045065%22.&searchmode=basic

陈志明（2012）。《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段颖、巫达译）。商务印书馆。（原著出版于 2004）

陈志明（2015）。跨文化交流与和谐社会愿景：从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谈起。*南方大学学报，3*，21-30。

丁守春（2013）。《漫话春节》。武汉大学出版社。

何国忠（2002）。《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华社研究中心。

赖观福、孟沙、钟泽才（1997）。《马来西亚华人节日风俗》。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莫光木（2010）。《马来西亚华人新年习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

沈立新（2002）。华侨华人社区民俗概论。载周南京（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页 809-879）。中国华侨出版社。

苏庆华（1994）。《节令、民俗与宗教》。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王琛发（2001）。《马来西亚华人民间节日研究》。艺品多媒体传播中心。

王文章（2010）。《中国传统节日》。中央编译出版社。

星洲网（2025，2 月 22 日）。巴生兴华醒狮采青贺岁，反响热烈，筹获 74 万。https://metro.sinchew.com.my/news/20250222/metro/6323533

曾玲（2003）。《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

郑名烈（2023）。马来亚独立前后永春会馆职能的演变。*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12*（1），73-87。

祝家丰（2013）。多元社会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调适：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抗争和变迁探析。*汉学研究学刊，4*，25-65。

Chan, L. W. (2016). *A toss of yee sang*.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Tourism Malaysia. (2018, March 6). *National Chinese New Year open house celebration brings cheer to Sungai Petani, Kedah*. https://www.tourism.gov.my/media/view/national-chinese-new-year-open-house-celebration-brings-cheer-to-sungai-petani-kedah

Vaughan, J. D. (1897).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ission Press.

Wang, G. W.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